

综述

中东欧转型研究 25 年来的文献评介

徐刚

【中图分类号】D73/77.51.09【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1094(2015)06-0070-0014

“1989年”的重要性怎么评价都不为过。最具比较含义的是，美国巴特勒大学教授大卫·梅森（David S. Mason）认为这年等同于“1789年”^①。的确，1989年东欧政局剧变及随后发生的大转型，对重新认识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和重塑欧洲大陆乃至世界的地缘政治格局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因此，1989年也是整个欧洲大陆历史的转折点^②。

过去25年来，东欧国家政局剧变及其后发生的转轨（转型^③）已经成为国际政治学、经济学乃至人类学和社会学中的显学，形成所谓的“转轨学”或“转型学”（transitology）^④。在后共产主义研究中，国内外学界对转轨（transition）和转型（transformation）混乱、交叉地使用着。丹麦学者米米·拉尔松（Mimi Larsson）对二者做了这样的区分：“转轨”在概念上被理解为一种直线的演进过程，它更强调政治和经济制度改革进程的结果，是一种向着已知和确定目标的改革。“转型”指改革的进程并非直线和可以预测的，而是一种向着崭新的和未知目标的改革。在过去1/4世纪中，有关中东欧转型的研究文献可谓汗牛充栋。研究的主要领域大致集中在三个层面：中东欧转型走过了怎样的历程？中东欧转型处于什么样的阶段？转型研究的学理意义为何？这里，根据国内外文献就前述

三个主要研究领域进行概述^⑤。

一、转型阶段的研究

中东欧国家的转型进程至今已逾25年，在转型进入整5年或整10年的时候，国内外学者均会对这一重大事件给予极大关注，并试图做出一些“总

① David S. Mason, *Revolutionary Europe 1789-1989: Liberty, Equality, Solidarity*, New York: Rowman and Littlefield, 2004.

② 牛津大学政治学教授蒂莫西·阿什（Timothy Garton Ash）指出，如果把“1989年”所涵盖的意义范畴延伸到包括两德统一和苏联解体的1990年和1991年，可以说这三年结束了整个世纪。Timothy Garton Ash, “1989!” *The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Vol. 56, No. 17, 2009. 转引自郭洁：《冷战与东欧——近二十年国外学界相关代表性研究及述评》，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1年第7期。欧洲议会党团人民党党团智库欧洲研究中心研究人员托米·哈赫坦恩（Tomi Huhtanen）认为，“1989年”发生的一切是欧洲现代史上最值得纪念的。Tomi Huhtanen, *The Meaning of 1989, European View*, No. 8, 2009.

③ Mimi Larsson, *Political Action in a Post-Socialist Society: An Anthropological Analysis of the Hungarian Telecottage Movement*, Århus University MA Research Thesis, 2004. 中国学者冯绍雷认为 transition 和 transformation 都是转型，前者较为常用，强调从一种形态转变为另一种形态的过程，而后者则更具有整体性、革命性的含义，也包含有强调突变的可能性。参见冯绍雷：《俄罗斯体制转型的路径依赖——从制度变迁与对外关系相关性视角的一项考察》，载《俄罗斯研究》2010年第6期。

④ 美籍华裔学者丹克沃特·罗斯托（Dankwart Alexander Rustow）早在1970年就发表了《民主转轨：一个动态模型》一文，对转轨概念进行了探讨，他也因此被称为“转轨学之父”。

⑤ 目前，国内学者关于中东欧转型的研究综述主要集中在东欧剧变和政治转型上。外国文献主要以英文文献为主。受篇幅所限，综述均只列举部分著作（或报告），而不引用论文。

【作者简介】徐刚，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助理研究员，政治学博士后。

结”，目的是考察转型到了什么阶段以及转型的正负效果各是什么。

转型的起点是剧变，研究中东欧转型必须交代东欧国家的剧变进程以及剧变初期的变化^①。一般认为，从1989年初波兰举行圆桌会议开始，政权剧变的火苗被点燃，改革让位于剧变，随后东欧各国连锁性地发生了制度更迭，并自此走上了以“民主化”、“市场化”和“欧洲化”为目标的转型之路。从大转型^②的视角看，剧变的阶段是比较短暂的。以往的历史进程显示，每次社会制度转型不仅耗时长（多则千余年，少则数百年），而且伴随着重大的人员和财产损失。以欧洲历史为例，从古罗马向封建社会过渡耗时近千年（公元前509年至公元476年），从中世纪到近代经历了大约1200年（476—1640年），从近代到现代（1640—1918年）走过了近280年。仅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从建立到政局剧变也维持了半个多世纪^③。此外，东欧国家政局变动的非暴力特征^④也凸显了剧变的短暂性。

尽管从历程上看东欧政局的变动是短暂的，但其历史影响却极其深远，一定意义上说不亚于前述欧洲历史从古至今的任何一次大的社会制度变迁。也正因为如此，有关东欧政局变动的研究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关注，其研究成果可谓汗牛充栋。在资料运用上，英语文献成果主要以基于档案（包括官方解密档案、当事人或见证者的忆述文献、基于前者基础上的学术成果）的研究和纯学理的探讨来呈现^⑤。相比之下，由于档案文献的缺乏，中国学界的研究多半以二手文献研究和推理研究为主^⑥。在研究视角上，英语文献成果几乎穷尽了剧变原因、过程、结果、意义等方面的研究，而且在每个问题领域下面都出现了不同的争论，同时使用了各种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相比之下，目前为止，中国学界对东欧剧变的研究多集中于对剧变原因和过程的分析上^⑦，少见对剧变结果和意义进行的学理性分析^⑧。同时，对剧变过程的研究也多是叙述式的，至于原因的解读，看似20多年来从未停止过，但深层次的分析仍不多见^⑨。令人欣慰的是，有关剧变原因的微观分析不断涌现出来，如从腐败角度分析东欧国家政局变化，讨论美国对东欧国家剧变的影响，以及探讨非政府组织、西方传媒与东欧剧变的变化。而在对剧变结果的分析上，学者多是在执政党的建设、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层面来

谈论剧变的教训，其中的研究取向不言自明。

剧变5年和10年后，部分中东欧国家政治经济转型初具雏形，引起了学者的广泛关注，迅速成为研究的小高潮。从国内学界的研究看，剧变5年后，主要是对中东欧走向市场经济的情况进行叙述^⑩；剧变10年后，研究向政治、经济、外交等各学科拓展^⑪。相比来说，国外学界的研究不仅成果多，而且研究内容也更细。突出的一点是，

① 有关学界20多年来对东欧剧变原因及其影响、遗产的文献评述，参见郭洁：《冷战与东欧——近二十年国外学界相关代表性研究及述评》；黄立菲、杨喆：《中东欧转型研究中待深入探讨的六个问题》，载《黑龙江社会科学》2013年第5期；朱晓中：《中东欧转型20年》，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6—9页。

② [英]波兰尼：《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冯钢、刘阳译，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有学者直接将中东欧转型称为“另一场大转型”，参见Richard Rose, Another Great Transformation: Eastern Europe a Decade Later, Journal of Democracy, Vol. 10, No. 1, 1999, pp. 51-56. 也有学者将中东欧国家融入欧洲称为“下一场大转型”，参见Grzegorz Ekiert and Jan Zielonka, The Next Great Transformation: the EU Eastward Enlargement, East European Politics and Societies, Vol. 17, No. 1, 2003.

③ 朱晓中：《转型九问——写在中东欧转型20年之际》，载《俄罗斯中亚东欧研究》2009年第6期。

④ 只有罗马尼亚发生了流血冲突事件，南斯拉夫国家在解体过程中发生了数场战争。

⑤ 有关英语世界对于东欧政局变动的研究参见郭洁：《冷战与东欧——近二十年国外学界相关代表性研究及述评》。

⑥ 客观地讲，由于国家的重视和研究力量较强，中国国内学界有关苏联解体的档案利用和研究要比东欧剧变的研究强许多。

⑦ 国外学者对圆桌会议的讨论较多，参见Jon Elster, The Roundtable Talks and the Breakdown of Communism,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6. 中国学界有较少的介绍性文章：谷秀英：《匈牙利召开“政治公开化”问题圆桌会议》，载《苏联东欧问题》1988年第3期。

⑧ 参见郭金梓：《东欧的变化和东西方关系的发展》，载《国际政治研究》1990年第1期；方连庆：《东欧局势的变化对东西方关系的影响》，载《西欧研究》1990年第1期；田士一：《试论东欧剧变对世界战略格局的影响》，载《国际政治研究》1990年第3期；宋以敏：《东欧剧变对美苏关系和世界格局的影响》，载《世界知识》1990年第21期。

⑨ 参见高放：《苏联、东欧剧变的根本原因何在？》，载《国际共运史研究》1992年第3期；刘祖熙：《东欧剧变的根源与教训》，东方出版社1995年版；陆南泉、姜长斌：《苏联剧变深层次原因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刘廷合：《苏东剧变主要原因探析》，山东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⑩ 王潼：《前苏联东欧国家经济转轨五年概观》，载《世界经济》1996年第3期；柴振荣：《东欧市场改革的5年：期望、结果与政策问题》，载《管理科学文摘》1998年第6期；张颖：《中东欧走向市场经济》，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

⑪ 例如，金雁：《十年来的东欧社会主义思潮》，载《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1999年第1期；马细谱：《十年来中东欧国家政治经济走向及其特点》，载《国际论坛》1999年第2期；孔田平：《制度变迁与经济转轨——对原苏联和东欧10年经济转轨的思考》，载《东欧中亚研究》2001年第1期；高德平：《东欧国家10年政治体制转轨》，载《东欧中亚研究》2001年第1期；李丹琳：《东欧国家十年转轨的社会代价与发展前景》，载《东欧中亚研究》2001年第4期；徐坡岭：《中东欧与俄罗斯经济转型十年：对比与借鉴》，载《东欧中亚研究》2001年第1期；张月明、姜琦：《政坛10年风云——俄罗斯与东欧国家政党研究》，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5年版；朱晓中：《十年巨变：中东欧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04年版；金雁、秦晖：《十年沧桑：东欧诸国的经济社会转轨与思想变迁》，东方出版社2012年版。

在中东欧转型 10 周年之际，欧洲复兴开发银行、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多家国际机构也纷纷对 10 周年的成败得失进行评述和分析。除了转型的成败得失外，其他一些重要的问题也得到关注。法国学者玛丽·拉维妮 (Marie Lavigne) 对西方学者 10 年来的相关研究进行了评述，重点对转型初期的“衰退”、“后华盛顿共识”、转型是否结束以及加入欧盟对转型的作用等问题进行了讨论。此文既是一篇很好的文献综述，又是一篇不错的研讨型文章^①。其中，作者还特别指出，格泽戈尔兹·W. 科沃德克 (Grzegorz W. Kolodko) 的研究对这几个问题给出了较好的回答^②。除了整体性研究外，一些国别研究也日益多见，并主要集中在对波兰转型 5 年和 10 年的讨论^③。

转型 15 年，正值第一批中东欧国家加入欧盟之年。或者因为这个原因转移了学者的注意力，有关中东欧转型 15 周年的论著少了许多，在中国学界这种现象更为明显。在国外学界，对中东欧国家转型 15 年来的经验总结以及一些国家如波兰、捷克等经济转型状况的研究较为多见^④。

转型 20 周年前后，国内外中东欧学界又掀起了一个研究小高潮。从国内学界的研究看，全面考察和局部 (国别或领域) 探讨的都有。金雁的《从“东欧”到“新欧洲”：20 年转轨再回首》一书虽然看上去没有给出结论，但无疑提供了一个开放式的分析平台，是国内比较受关注的关于中东欧转轨 20 年全面分析的论著^⑤。曲文铁从体制变革进展、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状况三个方面比较研究了原苏东国家的转轨实践，认为一方面这些国家存在后发赶超优势，另一方面体制转换速度与收入分配状况并无实质性关联^⑥，这在一定程度上回答了转型 20 年给中东欧带来了怎样的经济效果这一问题。徐坡岭和韩爽引入“约束条件”讨论政治转型与经济转型存在什么关联的问题。他们认为，中东欧国家转型目标、转型的策略选择与次序安排相互制约，并共同规定了转型的基本方向和演进轨迹^⑦。孔田平在讨论经济转轨是否结束及其标准时指出，经济转轨的任务基本结束，但从大转型的全方位角度来考察则“尚未终结”^⑧。朱晓中则具体从人们惯常使用的经济指标、机构指标和政治指标来判定经济转型是否完成，并根

据中东欧国家在金融危机中的表现认为经济转轨仍有漫长的路要走^⑨。中国学界也对转型 20 年的经验与教训进行了研究^⑩。

不同于中国学界的研究，国外学界的研究具有更高的理论层次和较强的学科意识。匈牙利学者克里斯蒂安·乔普拉尔-德戈维奇 (Krisztián Csaplár-Degovics) 等学者 2010 年出版的《二十年之后——中东欧转型的原因和结果》论文集中对东欧转型的理论体系的变化、各国政治经济转型的模式以及东欧各国转型进程的不同特点做了历史和现实的考察^⑪。在彼得·朗 (Peter Lang) 出版社出版的中东欧跨学科研究系列^⑫中，尼古拉斯·哈约兹 (Nicolas Hayoz) 等学者主编的《共产主义崩

① Marie Lavigne, Ten Years of Transition: a review article, Communist and Post-Communist Studies, Vol. 33. No. 4, 2000.

② Grzegorz W. Kolodko, From Shock to Therapy: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Postsocialist Transformati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③ Sue Faulkner, Jim McLoughlin and Stanislaw Owsiak, Polish Transition Ten Years on: Processes and Perspectives, Aldershot: Ashgate Pub Ltd, 1999; Oleh Havrylyshyn, A Decade of Transition: achievements and challenges, Washington, D. C. : IMF Institute, 2001; Mario I. Blejer and Marko Škreb, eds., Transition: The First Decade, Cambridge: The MIT Press, 2002.

④ Richard J. Hunter Jr. and Leo V. Ryan, A Transitional Analysis of the Polish Economy: After Fifteen Years, Still a 'Work in Progress', Global Economy Journal, Vol. 5, No. 2, 2005.

⑤ 金雁：《从“东欧”到“新欧洲”：20 年转轨再回首》，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1 年版。

⑥ 曲文铁：《制度变迁的经济效果——原苏东国家经济转轨 20 年回顾》，载《俄罗斯中亚东欧研究》2011 年第 2 期。

⑦ 徐坡岭、韩爽：《中东欧独联体转型 20 年——经济市场化任务再思考》，载《贵州财经学院学报》2011 年第 1 期；徐坡岭、韩爽：《中东欧独联体政治经济转型 20 年：约束条件与转型政策、策略选择》，载《俄罗斯研究》2011 年第 5 期。

⑧ 孔田平：《国际金融危机背景下对中东欧经济转轨问题的再思考》，载《国际政治研究》2010 年第 4 期；孔田平：《尚未终结的革命——中东欧转型 20 年》，载《南风窗》2010 年第 12 期。

⑨ 参见朱晓中：《转型九问——写在中东欧转型 20 年之际》；朱晓中：《入盟后中东欧国家的发展困境》，载《国际政治研究》2010 年第 4 期。

⑩ 孔田平：《巨变 20 年，东欧再度面临抉择》，载《中国改革》2009 年第 8 期；俞邃：《东欧国家 20 年发展中的共识与共性》，载《当代世界》2009 年第 12 期；郭洁：《东欧剧变 20 年：回望与反思》，载《中国延安干部学院学报》2010 年第 5 期；孔寒冰、项佐涛：《二十年东欧转型过程中的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载《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0 年第 5 期；陈兆旺、胡德平：《剧变之后是转型——苏东欧剧变 20 年后的思考》，载《上海人大月刊》2012 年第 2 期；朱晓中：《中东欧转型 20 年》，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3 年版。

⑪ Krisztián Csaplár-Degovics, Miklós Mitrovits and Csaba Zahorán, eds., After Twenty Years: Reasons and Consequences of the Transformation in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 Berlin: Osteuropa-Zentrum, 2010.

⑫ 该系列丛书从 2005 年起开始出版，至今已出版 11 部。这些著作在区域上涵盖了原苏联东欧国家，在内容上涉及政治、经济、外交等领域，是一套较好地研究后共产主义国家转型的丛书。

溃后的 20 年：1989 年的期许、成就与破灭》一书充分体现了该系列丛书的特点，从政治学、人类学、历史学、经济学、文学批评、文化学以及哲学的层面对 20 年转型的成就与存在的问题进行了讨论，特别将这些国家分成了加速向欧洲转型并获得成功的国家、遭遇国家解体也同样向欧洲靠拢的前南斯拉夫和捷克斯洛伐克后继国以及以俄罗斯和白俄罗斯为代表的放弃转型（abandoned transformation）国家^①。同一年出版的波兰前总理、波兰经济改革设计师格泽高兹·W. 科勒德克（Grzegorz W. Kolodko）和波兰科兹明斯基大学的亚采克·托姆克维奇（Jacek Tomkiewicz）合著的《转型 20 年：成就、问题与展望》延续了这一思路，对转型 20 年来中东欧（以及俄罗斯和中国）各领域取得的成就和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剖析，并对转型的前景进行了展望^②。阿伯丁大学教授理查德·罗斯（Richard Rose）对中东欧国家经济转型、政治转型以及与转型相关的一些重大问题进行了全方位的考察^③。此外，还有一些学者对中东欧国家第二个十年转型进行了总体的和分领域的评估^④。

除了综合性研究外，对某个领域或某个国家转型 20 年进行的探究层出不穷。伊丽莎白·巴克（Elisabeth Bakke）和因哥·彼特（Ingo Peters）从政治层面对中东欧国家转型 20 年的政党政治、民主化进程进行了深入的研究^⑤；巴克和尼克·西特（Nick Sitter）对 1992—2012 年期间捷克、斯洛伐克和匈牙利选举政治中政党获胜的稳定性进行了研究^⑥。杰拉德·图雷（Gerard Turley）和彼特·卢克（Peter Luke）对中东欧国家经济转型的进程、成绩与教训进行了深入的分析，更为重要的是他们还中东欧国家经济转型 20 年的研究文献进行了评述并提供了目录索引，非常具有价值^⑦。罗马尼亚前总理阿德里安·讷斯塔塞（Adrian Nastase）在《当代世界》发表中文文章，回答了转型 20 年后“罗马尼亚处在什么发展阶段”和“罗马尼亚必须怎么做”两大问题^⑧。另外，对中欧四国或巴尔干国家经济转型 20 年的研究文献也有不少^⑨，而将中东欧国家与其他转型国家如独联体进行比较的文献也时有出现^⑩。在国别研究中，有学者讨论了波兰不同阶层群体对 20 年转型存在的不同看法，也有学者分析了特兰西瓦尼亚匈牙利族人对罗马尼亚转型进

程产生的影响^⑪。

转型 20 周年之际正是欧洲金融危机发酵时期，所以还应提到的是这一时期不少著述对中东欧国家的经济发展有特别的重视。中东欧多数国家遭受危机的冲击推动了人们对经济发展模式的重新评估^⑫。在中东欧经济发展模式中，接受外部援助是一个特征，深刻地影响了其内部产业结构。比如，有学者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中东欧国家经济转型中扮演的作用进行了探讨^⑬，还有学者考察了中东欧国家转型 20 多年来银行业和金融业的运行情

① Hayoz, Nicolas, Jesien, Leszek and Koleva, Daniela, eds., 20 Years after the Collapse of Communism Expectations, Achievements and Disillusions of 1989, Bern: Peter Lang, 2011.

② Grzegorz W. Kolodko and Jacek Tomkiewicz, eds., 20 Years of Transformation: Achievements, Problems and Perspectives, New York: Nova Science Publishers, Inc., 2011.

③ Richard Rose, Understanding Post-Communist Transformation: A bottom-up approach,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9.

④ Gareth Dale, First the Transition, Then the Crash: Eastern Europe in the 2000s, London: Pluto Press, 2011; Ognjen Radonjić and Srdan Kokotović, The Second Decade of Transition in Emerging Europe, Belgrade: University of Belgrade, 2012; Lorenzo Rocco, Giorgio Brunello and Elena Crivellaro, Lost in transition?: The returns to education acquired under communism in the first decade of the new millennium, Economics of Transition, Vol. 20, No. 4, 2012.

⑤ Elisabeth Bakke and Ingo Peters, 20 Years since the Fall of the Berlin Wall: Transitions, State Break-Up and Democratic Politics in Central Europe, Singapore: Intersentia, 2011.

⑥ Elisabeth Bakke and Nick Sitter, Why do parties fail? Cleavages, Government Fatigue and Electoral Failure in the Czech Republic, Slovakia and Hungary 1992–2012, East European Politics, Vol. 29, No. 2, 2013.

⑦ Gerard Turley and Peter Luke, Transition Economics: Two Decades On, London: Routledge, 2010; László Csaba, Book Reviews, Acta Oeconomica, Vol. 61, No. 4, 2011.

⑧ [罗马尼亚]阿德里安·讷斯塔塞：《东欧二十年转型风暴：从集权主义到全球化》，载《当代世界》2010年第1期。

⑨ Krzysztof Bledowski, Twenty Years of Economic Transition in Central Europe: A Short Narrative in Numbers, Center for Transatlantic Relations, 2009; Monastiriotis, Vassilis and Petrakos, George, Twenty Years of Economic Transition in the Balkans: transition failures and development challenges, Southeastern Europe, Vol. 34, No. 2, 2010.

⑩ Twenty Years of Transition towards The East European and CIS Countries in the World System, Bruges, June 3, 2011;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 and the CIS: 20 years on, in Turley, G. and Hare, P. G. eds., Handbook of the Economics and Political Economy of Transition, London: Routledge, 2013.

⑪ Jacqueline Hayden, Poland's Troubled Transition, 1989–2008, London: Routledge, 2015; Nicolas Franckx, The Hungarian Minority of Transylvania: A First Assessment of the Transition Period 1990–2007, Pieterlen: Peter Lang International Academic Publishers, 2011.

⑫ Charles Wyplosz, Twenty-Five Years Later: Macroeconomic Aspects of Transition, The Graduate Institute, Geneva, and CEPR, June 2014.

⑬ IMF Report: “25 Years of Transition: Post-Communist Europe and the IMF” Washington, D. C. :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2014.

况^①，也有学者对中东欧转型 20 年来的情况进行总的评估^②。

中东欧国家转型的前景是什么？有学者在转型 20 周年之际对转型 40 年的未来前景进行预测，批驳了中东欧地区已经在制度上成为完全成熟的市场经济体的论点，认为中东欧国家在转型方面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同时强调，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型进程不会呈直线型发展^③。也有学者认为，中东欧转型 25 年以来，各国都在朝一个“正常国家”发展^④。

2014 年是中东欧国家转型 25 周年。中东欧国家和国际社会对中东欧转型的关注度仍然很高，并且举行一系列相关研讨会。据中东欧研究门户网站 (<http://www.pcob.eu/>) 不完全统计：2 月 2—3 日，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斯拉夫研究协会和澳大利亚共产主义与后共产主义研究协会联合召开“后共产主义的四分之一世纪：跨学科的视角”国际研讨会；3 月 23 日，罗马尼亚布加勒斯特大学举办“转型挑战：后共产主义经验”国际跨学科研讨会；4 月 10 日，奥地利驻英大使馆和伦敦大学学院斯拉夫东欧研究学会联合举办“25 年中欧的进步与 25 年铁幕的降落”研讨会；6 月 12—14 日，波兰交流协会与弗罗茨瓦夫大学联合举办第七届国际中东欧媒体会议暨“变革中的媒体与民主：中东欧 25 年的媒体自由与公共领域”研讨会；6 月 17—19 日，罗马尼亚研究协会在布加勒斯特举办“过去、现在与未来：罗马尼亚与摩尔多瓦政局变化 25 周年”研讨会；9 月 24—26 日，日内瓦国际发展研究院举办“大转型？对冷战结束原因与结果的再评估”研讨会；11 月 20—21 日，罗马尼亚文化记忆基金会 (Memoria Cultural Foundation) 和国家行政警察学院联合举办“25 年之后：共产主义的历史与记忆”研讨会；11 月 28 日，波兰卢布林大学和中东欧研究所联合举办“转型 25 年：公众对 1989 年转型的认知”研讨会。另外，波兰东方研究所 (The Eastern Institute) 2014 年举办的第 24 届经济论坛有两个专题讨论“转型 25 年后中欧国家的新角色”和“新东欧的 25 年”。

在中国，有关研究机构也举办一些有关中东欧转型 25 周年的研讨会。比如，2014 年 7 月，在清华大学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术共同体会议上有“中

东欧转型 25 周年：经验与比较”小型研讨会；2014 年 10 月，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举办的第二届“中国—中东欧”会议期间，专门设立了“中东欧转型 25 周年：经验与教训”的专题研讨会。更为重要的是，由中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欧亚社会发展研究所马细谱研究员和李少捷研究员合编的《中东欧转轨 25 年：观察与思考》一书是目前国内唯一一本对中东欧国家转型 25 年的状况、取得的成就、存在的问题以及一些新现象进行全面观察与思考的著作^⑤。

二、转型重要问题的研究

转型是个宏大的系统工程，是复杂系统的大规模制度变迁，由其派生出来的问题繁多^⑥。东欧国家政局变动和苏联解体以来，有关转型的研究已经成为一个重要的理论生长点。就中东欧国家而言，人们往往从政治、经济、外交三个层面将“民主化”、“市场化”以及“欧洲化”归纳为这些国家转型的目标，但这三者所包含的问题和领域却异常丰富。匈牙利著名经济学家雅诺什·科尔奈 (János Kornai) 就曾指出：中东欧的转型是大转型，是全面的转型，涉及经济、政治结构、政治意识形态、法律体系和社会的分层化^⑦。从政治、经济、外交三大块来总结中东欧国家的转型虽然抓住了问题的

^① Roman Matousek, *Banking and Financial Markets in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 20 Years of Transition*, Basingstoke: Palgrave Macmillan, 2010.

^② Leon Marc, *What's So Eastern About Eastern Europe?: Twenty Years After the Fall of the Berlin Wall*, Trowbridge: Oldcastle Books, 2010; Thomas Apolte, *Democracy and Prosperity in Two Decades of Transition*, *Economics of Transition*, Vol. 19, No. 4, 2011.

^③ [波兰]格泽戈尔兹·W. 科勒德克：《1989—2029 年大转型——可以更好或将会更好吗？》，潘兴明译，载《俄罗斯研究》2009 年第 3 期。

^④ Andrei Shleifer and Daniel Treisman, *Normal Countries: The East 25 Years After Communism*, *Foreign Affairs*, November/December 2014.

^⑤ 马细谱、李少捷：《中东欧转轨 25 年：观察与思考》，中央编译出版社 2014 年版。

^⑥ 需要强调的是，学界关于转型与转轨之间的争论一直存在。转轨是大规模制度变迁的一个过程 (Mathias Dewatripont and Gérard Roland, *Transition as a Process of Large-Scale Institutional Change*, *Economics of Transition*, Vol. 4, No. 1, 1996)，而转型是大规模制度变迁本身。在讨论中也易发现，讨论转轨是否结束的话题多，少见对转型是否结束的谈论。

^⑦ János Kornai, *The Great Transformation of Central Eastern Europe: Success and Disappointment*, *Economics of Transition*, Vol. 14, No. 2, 2006.

重点,但并不全面,甚至有可能疏漏一些更具根本性的问题域和影响因子。比如,一些与之关联且外延性较强的问题如社会转型、法律转型以及宗教、文化、民族对转型的影响等容易被忽视,其他一些比较微观的问题如移民、法治、农业等难以囊括其中,就连政治、经济、外交之间的互动逻辑关系以及外部环境对一国转型的影响也不易体现。因此,这里主要以问题为导向试图对与转型相关的重要领域进行归纳和评述。

第一,转型的初始条件与约束条件。过往的研究经常不加区分地使用“转型的初始条件”与“转型的约束条件”这两个概念。但如果深入思考就会发现,对于转型研究而言,这样做在理论上失之严谨。关于转型约束条件的描述或罗列,最常见的一种说法是用“转型的起点”或“转型的初始状态”来表示。这是对转型约束条件的简单化理解,因为这样的概括即使详尽和周到,充其量也只是给出了转型列车出发地的客观状况,并没有指出转型列车行进途中的轨道状况。所以,转型的约束条件是两方面因素的综合,即“转型的初始条件”和“转型过程的约束条件”^①。在实现转型国家的发展目标中,改革设计者必须充分考虑“初始条件”和“约束条件”,周密制定每个转型阶段的转型任务,帮助国家实现转型成功^②。事实上,转型国家经济增长的实际情况与该国的初始条件和政策推行者的改革速度都存在关联^③。

显然,转型的初始条件和约束条件是有所不同的。转型的初始条件包括经济改革的历史、经济发展水平、政治文化传统、宗教及地缘政治经济条件等,而转型的约束条件则涵盖转型的目标模式、转型的外部约束及大国影响等^④。转型的初始条件,又可以细分为与转型相关和不相关的初始条件两类^⑤。在这些研究中,从整个区域和国别进行的研究都有^⑥。其中,从路径依赖(Path-Dependence)层面来讨论转型的初始条件成为一个重要视角,可以帮助人们更好地理解历史、文化传统以及地缘政治等因素对转型进程所产生的影响^⑦。朱晓中突出强调了“路径依赖”中的帝国遗产因素。他指出,帝国遗产论似乎是影响中东欧国家转型的“路径依赖因素”中影响最大的。所谓帝国遗产论是指,中东欧国家转型的进程和质量差异是

由中东欧曾经的宗主国奥斯曼帝国和奥匈帝国留给中东欧的历史遗产造成的。一些研究者认为,由于两个帝国本身在诸多方面的差异,曾受奥斯曼帝国统治的东南欧国家的转型进程较慢,问题较多^⑧。

第二,转型的路径与方式。由中央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一般有两种方式:激进方式,又称“大爆炸”方式或“休克疗法”;渐进方式,或称“增量改革”方式。两种方式的主要特征是,前者强调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尽可能多地改革,后者主张通过部分的和分阶段的改革来实现变革^⑨。1989年,已在玻利维亚经济改革中名声大噪的哈佛大学教授杰弗里·萨克斯(Jeffrey Sachs)被聘为波兰政府经济顾问,他提出“以激进、一步到位的方式稳定宏观经济同时向市场经济转型”的提议获得波兰政府接纳,波兰在经济上开启了“休克疗法”的变革^⑩。用萨克斯自己的话说:当时的波兰经济特别需要迅速的宏观经济行动,因为旧体制被打破导致了剧烈的金融动荡,1989年末出现恶性通货膨胀^⑪。这种转型方式为多数中东欧国家所接受,捷克、斯洛伐克和保加利亚于1991年、

① 参见程伟:《中东欧独联体国家转型比较研究》,经济科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23页。

② 参见朱楠:《转型发展的初始条件和约束条件及其路径选择》,载《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5期;朱楠、任保平:《转型国家转型发展的初始条件和约束条件分析》,载《未来与发展》2010年第11期。

③ [美]威廉·哈勒根、张军:《转轨国家的初始条件、改革速度与经济增长》,载《经济研究》1999年第10期。

④ 殷红、王志远:《中东欧转型研究》,经济科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15页。

⑤ 谢作诗:《转轨国家转轨的初始条件、转轨方式与经济绩效》,载《世界经济研究》2002年第4期。

⑥ Roman Frydman, Andrej Rapaczynski and John S. Earle, *The Privatization Process in Central Europ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⑦ Merlevede B., *Stabilisation, Reform, Initial Conditions and Output Paths in Transition Economies*, in Charemza W. and Strzala K, eds., *East European Transition and EU Enlargement: A Quantitative Approach*, Berlin: Physica-Verlag, 2002.

⑧ 作者还列举了有关奥匈帝国和奥斯曼帝国对中东欧国家转型的影响的讨论文献,参见朱晓中:《中东欧转型20年》,第13页。

⑨ 参见世界银行:《1996年世界发展报告:从计划到市场》,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6年版。关于这两种转型方式的特征可分别借用两位政治领导人更加直白的话来表示。

⑩ 主张和支持“休克疗法”的,除了被誉为“休克疗法之父”的萨克斯以外,还有不少代表人物,如李普顿(David Lipton)、阿斯兰德(Anders Aslund)、伯格(Andrew Berg)等。

⑪ Jeffrey Sachs, *The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of Eastern Europe: The Case of Poland*, *The American Economist*, Vol. 36, No. 2, 1992.

俄罗斯于1992年均选择了“休克疗法”。而匈牙利认为其市场经济体制比较成熟,选择了渐进式过渡模式。

20世纪90年代,中国学者对两种转型路径的探讨从未中断,并主要集中于对这两类转型的技术演进的分析^①。进入新世纪,讨论虽然不多,但并没有局限于技术探讨和是非判断,而是上升到了理论或战略层面加以分析^②。越来越多的学者认为,转型路径无绝对的优劣之分,它们各有利弊。判断经济发展和质量需要立足于本国实际,认为激进改革绝对优于渐进改革,或者反过来认为渐进改革绝对优于激进改革,无非是从一个极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既存在着理论上的片面性,也经不起实践的检验。关于“休克疗法”,在国内外学界均已经广泛争论。爱德华·扎吉塞克(Edward K. Zajicek)和詹姆斯·赫斯勒(James B. Hiesler)针对前引萨克斯关于波兰“休克疗法”的论述,认为萨克斯对“休克疗法”过于乐观,并对波兰转型头三年的情况进行了评述^③。夏振坤认为,中东欧国家转型是一种反稳定的改革,它们在政治上破坏了社会制衡中枢、经济上实行全面私有化、改革策略上采取了过激的“休克疗法”的转型实际上构成了“三位一体的大误区”,是不成功的^④。其他学者也都注意到了中东欧国家转型初期“休克疗法”的不成功。

不过,无论实行“休克疗法”还是渐进改革,中东欧国家经济转型的内涵并无多大差异。大卫·李普顿(David Lipton)、萨克斯等人认为,中东欧国家从中央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三个要素是宏观经济的稳定化、价格及国际贸易的自由化和国有经济的私有化,即稳定化、自由化和私有化^⑤。孔田平则指出,经济转型也是一个制度化的过程,除了前面三个要素外还应包括制度化^⑥。

对于中东欧国家的私有化,中国学界给予了较大的关注,不过也主要集中于20世纪90年代中前期。这些研究主要以介绍中东欧国家的私有化进程以及影响为主,鲜见从经济学视角进行的机理探讨^⑦。相反,国外学者的研究不仅细微(有国别或领域研究),而且更具学理价值(包括政治经济学的讨论以及私有化与所有制关系的分析等)^⑧。在国别研究中,波兰和匈牙利是学者普遍关注的重点^⑨。另外,有学

者对东欧国家在转型过程中通过私有化实现的主要目标进行了概括,它们包括有效的管理控制、经济重组、限制社会调整的成本、吸收外国资本和经验、创造竞争性市场结构、公平的初始财富分配和保护政府收益^⑩。还有学者对中东欧国家的住房私有化、福利政策与私有化关系等问题进行了富有洞见的考察^⑪。相比较而言,国内学者对中东欧国家的市

① 朱行巧:《“休克疗法”的成效辨析》,载《世界经济》1992年第7期;冯存诚:《“休克疗法”在东欧何以接受受挫》,载《世界经济与政治》1992年第9期。

② 陈霞:《萨克斯的“休克疗法”及其评价》,载《武汉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2期;开文明:《激进式和渐进式改革的评价》,载《世界经济情况》2007年第2期;李绍荣、程磊:《渐进式与休克疗法式改革的比较分析》,载《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6期;徐朝阳、林毅夫:《发展战略、休克疗法与经济转型》,载《管理世界》2011年第1期;赛晓序:《双重视角下激进与渐进改革方式优劣的评判》,载《理论学刊》2011年第8期。

③ Edward K. Zajicek and James B. Hiesler, *The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of Eastern Europe: The Case of Poland-Comment*, *The American Economist*, Vol. 39, No. 1, 1995.

④ 参见夏振坤:《发展经济学新探》,武汉出版社1997年版,第382—386页。

⑤ David Lipton and Jeffrey Sachs, *Creating a Market Economy in Eastern Europe: The Case of Poland*, *Brookings Papers on Economy Activity*, Vol. 1, 1990.

⑥ 孔田平:《中东欧经济转型的成就与挑战》,载《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12年第2期。

⑦ 孔田平:《体制转变中的东欧私有化》,载《东欧中亚研究》1992年第3期;陆福英:《九十年代初东欧国家私有化的发展及其前景》,载《世界经济》1992年第5期;左建龙:《东欧中亚国家的私有化进程中的困难》,载《世界经济与政治》1992年第12期;余泽青:《东欧私有化进程及其问题》,载《国际共运史研究》1993年第1期;葛霖生:《试论原苏联东欧国家的非国有化和私有化》,载《东欧中亚研究》1994年第5期;张颖:《关于东欧国家私有化问题的探讨——概念、目的和形式》,载《东欧中亚研究》1994年第6期;景维民、孙秋鹏:《俄罗斯与东欧国家的私有化评析》,载《南开经济研究》2001年第2期;许新:《转型经济的产权改革——俄罗斯东欧中亚国家的私有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

⑧ John S. Earle and Roman Frydman, *Privatization in the Transition to a Market Economy: Studies of Preconditions and Policies in Eastern Europe*,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1993; Hans Smit and Vratislav Pechota, *Privatization in Eastern Europe: Legal, Economic, and Social Aspects*, New York: Juris Pub Inc., 1994.

⑨ 关于波兰私有化的代表论著有: David Lipton and Jeffrey Sachs, *Privatization in Eastern Europe: The Case of Poland*, *Brookings Papers on Economic Activity*, Vol. 2, 1990; Elizabeth C. Dunn, *Privatizing Poland: Baby Food, Big Business, and the Remaking of Labor*,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4; Gianni De Fraja and Barbara M. Roberts, *Privatization in Poland What was the government trying to achieve? Economics of Transition*, Vol. 17, No. 3, 2009. 关于匈牙利私有化的代表论著有: Istvan Tamas, *Capital Transformation and Privatization in Hungary*, New York: Vantage Press, 1999; Zoltan Antal-Mokos, *Privatisation, Politics,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 in Hungar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0.

⑩ Klaus M. Schmidt and Monika Schnitzer, *Privatization and Management Incentives in the Transition Period in Eastern Europe*,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 Vol. 17, No. 2, 1993.

⑪ David Clapham et al., *Housing Privatization in Eastern Europe*, Greenwood Press, 1996; Demetrius S. Iatridis, *Social Justice and the Welfare State in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 The Impact of Privatization*, London: Praeger, 2000.

市场化^①和自由化^②的讨论则明显不如私有化多。

第三,中东欧国家通过转型建立起了何种类型的资本主义?^③不同的学者根据不同的要素分析将中东欧国家的资本主义类型化。一些学者称,如果以自由市场经济和协调的市场经济为出发点,只有爱沙尼亚和斯洛文尼亚可以被明确纳入自由市场经济或协调的市场经济范畴(这两国也不完全具备资本主义类型模式的所有要素),而其他中东欧国家则处于两者之间。但无论如何,中东欧国家都不属于近年来在批判自由市场经济或协调的市场经济中出现的其他类型的资本主义。他们既不是法国的国家资本主义,也不是南欧的资本主义^④。比如,戴维·莱恩(David Lane)和马丁·麦安特(Martin Myant)根据私营部门在国内生产总值(GDP)中的比重、私有化指标、股票市场、资本化和信贷、收入不平等、参与全球经济等指标认为,斯洛文尼亚、捷克、匈牙利、波兰和爱沙尼亚是国家协调的市场资本主义类型^⑤。马克·克奈尔(Mark Knell)和马丁·斯尔霍雷茨(Martin Srholec)以社会凝聚力(包括基尼系数、最高的边际个人所得税率、政府最终消费支出)、劳动力市场法规(世界银行标准)、商业法规(世界银行关于创业、破产、金融领域与银行部门有关的股票市场标准)为综合指数将中东欧国家分为战略协调型与(自由)市场协调型,前者有白俄罗斯、乌克兰、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罗马尼亚、捷克、乌兹别克斯坦,后者则包括保加利亚、格鲁吉亚、摩尔多瓦、波兰、斯洛伐克、匈牙利、爱沙尼亚、俄罗斯^⑥。卢西恩·塞尔纳特(Lucian Cernat)以劳资之间讨价还价的主导类型,国家干预、银行部门和金融机构的作用、内部制度一致性的水平为要素将中东欧国家分成三个类型:爱沙尼亚为盎格鲁-撒克逊模式;波兰、斯洛伐克、保加利亚、拉脱维亚、立陶宛属大陆模式;匈牙利、斯洛文尼亚、捷克为发展型模式。关于罗马尼亚,他认为虽然许多学者将罗马尼亚纳入大陆模式来分析,但显然不全面,罗马尼亚是两种模式的混合资本主义,在20世纪90年代以国家为中心^⑦。

可见,中东欧国家成为分析西方资本主义类型理论的试验场。然而,有学者认为,资本主义类型理论的一般意义,以及这些类型理论能否用来分析

中东欧国家资本主义仍需进一步深入讨论^⑧。朱晓中指出,不能简单地将资本主义类型理论应用于中东欧国家,它低估了跨国公司在不同制度环境中所发挥的作用,也不能确切地反映中东欧国家与西方发达国家之间的差异内涵。因此,要使资本主义类型理论反映中东欧国家资本主义现实,资本主义类型理论至少要在区分发达国家与新兴市场国家、经济—政府关系中的欧盟要素以及国家—商业关系三个层次进行校正^⑨。

虽然将资本主义类型理论套用到中东欧国家并不完全恰当,但是对中东欧国家的转型进行分类是可能的。在观察和理解中东欧国家的转型时,学者们已经从早期的双重转型(政治民主化、经济市场化)扩展到三重转型(加上国家性),至于西巴尔干国家则还要延伸至四重转型(再加公民国家建设)^⑩。所谓国家性(stateness),主要是指关于现代国家、现代民族主义和现代民主之间的三边关系,具体指向一个稳固的主权国家的权威和实施决策的官僚能力^⑪。对于一些中东欧国家以及原苏联后继国来说,国家性问题至关重要,它不是简单的国家观念或国家意识问题,而是国家建构本身的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讲,这些国家仍然处于国家性的构建当中。而在从南斯拉夫联邦和捷克斯洛伐克联邦解体后成立的新独

① 邹薇、庄子银:《转型:东欧市场化实践的反思与启示》,载《社会科学战线》1994年第3期; Erdener Kaynak, *Marketing in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 London: Routledge, 1997.

② 王学鸿:《东欧经济自由化:问题与前景》,载《今日东欧中亚》1996年第3期; Werner Baer and Joseph Leroy Love, eds., *Liberalization and Its Consequences: A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on Latin America and Eastern Europe*, London: Edward Elgar Pub, 2001.

③ 该部分的内容经朱晓中研究员允许参考其文《中东欧国家转型和资本主义类型》,载《俄罗斯中亚东欧研究》2014年第2期。

④ 朱晓中:《中东欧国家转型和资本主义类型》。

⑤ David Lane and Martin Myant, *Varieties of Capitalism in Post-Communist Countries*, Hampshire: Basingstoke, 2007.

⑥ Mark Knell and Martin Srholec, *Diverging Pathways in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 in David Lane and Martin Myant, eds., *Varieties of Capitalism in Post-Communist Countries*, pp. 40-62.

⑦ Lucian Cernat, *Europeanization, Varieties of Capitalism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 in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 Basingstoke: Palgrave Macmillan, 2006.

⑧ 朱晓中:《中东欧国家转型和资本主义类型》。

⑨ 同上。

⑩ Claus Offe, *Capitalism by Democratic Design? Democratic Theory Facing the Triplic Transition in East Central Europe*, *Social Research: An International Quarterly*, Vol. 71, No. 3, 2004.

⑪ Arolda Elbasani, ed., *European Integration and Transformation in the Western Balkans: Europeanization or business as usual?* London: Routledge, 2013.

立国家中，民族问题（和冲突）对转型的消极影响日益显现，民族认同和国家重建遂成为转型的一个内容。

与此相关的是，许多学者注意到了中东欧经济转型出现的不同模式^①，经济发展也存在一定的差异。安德斯·阿斯伦德（Anders Åslund）根据市场经济发展程度、民主化水平、腐败状况等将原苏东国家分为波罗的海国家、中欧四国、东南欧国家、独联体九国和独联体三国（白俄罗斯、土库曼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等五个类别。弗朗索瓦·巴富瓦尔（Francois Bafoil）对中东欧国家转型考察时也将他们分为“三个板块、四类国家”。一兵根据经济转轨的进度和经济发展存在的差别，将中东欧国家分为三个类别：第一类包括波兰、捷克、匈牙利、斯洛伐克和斯洛文尼亚；第二类有罗马尼亚、保加利亚、阿尔巴尼亚；第三类是受战乱影响的前南斯拉夫其他四国，即南斯拉夫联盟、克罗地亚、马其顿和波黑^②。

第四，转型进程中的市场化与民主化的关系，与之相关的是二者的进度如何？^③其一，市场化与民主化是否兼容？有关这个话题国外学界至少出现了三种观点。早在东欧国家政局变动后不久，美国学者亚当·普沃斯基（Adam Przeworski）在对中东欧政治经济改革进行研究后提出了“破产论”。他指出，市场化的过程不可避免伤害一些群体的利益，并激起一些政治势力的反对，从而影响市场化或者民主化进程；民主化的成功要求公平、有效的制度环境，但在市场化条件下，民主制度难以兼顾公平与效率，一旦民主遭到削弱，追求改革就可能致政治动荡，以致人们不得不在放弃改革与抛弃代议民主制度之间做出选择^④。“破产论”并没印证中东欧国家的现实。在转型即将进入第一个十年之际，匈牙利学者贝拉·格雷什科维奇（Bela Greskovits）以亲历者的视角对中东欧国家的政治经济转型进行了观察和分析，进而提出了“低水平均衡论”。他认为，在中东欧，对困难经济局面的抗议一直都是零散的、非暴力的或者是缺乏影响的，参与性的民主参与机制与排他性的经济决策机制在这里形成一种微妙的平衡，民主制度与市场经济被同时引进。但经济转型只有以低速、温和的方式进行才是可行的，才不会对民主制度产生巨大冲

击，经济转型的一些缺陷与不足也得以包容。与西方发达的市场民主体制相比，中东欧经济与政治体系的均衡状态处于较低的水平。在可预见的将来，这种低水平均衡将是大部分中东欧国家政治经济制度的特点^⑤。进入2000年，关于市场化与民主化关系的讨论仍然受到广泛关注，并集中在“阶段论”的研判上。曾担任波兰第一副总理兼财政部长、被称为波兰改革总设计师的格泽戈尔兹·W.科勒德克（Grzegorz W. Kolodko）提出了“二阶段论”。他认为，民主和市场之间是协调的，但不意味着在民主化和市场化过程中也总是协调的。从短期看，市场化和民主化都会面临各种各样的压力。而从长期看，当经济走向增长后，民主化和市场化就容易建立起正反馈的关系，即市场制度越完善，民主化越容易推行。因此，尽管苏东转型国家出现了困境并付出了巨大的转型成本，但它们都没有抛弃民主制度，最坏的情况就是一些促进民主发展的重要改革措施被推迟或被耽搁，但其总体进程仍在向前推进。这本身就是一个重大的成就^⑥。美国学者斯蒂芬·海歌德（Stephan Haggard）和罗伯特·考夫曼（Robert R. Kaufman）在对民主化转型的研究中也提出了类似的观点，一个阶段是从威权体制中的退出，另一个阶段是比较长时段内的巩固^⑦。此后不

① Roberta Capello and Giovanni Perucca, *Globalization and Growth Patterns in Eastern European Regions: From the Transition Period to the Economic Crisis*, European Union's Seventh Framework Programme working paper 1, February 2013; 孔田平:《东欧经济改革:模式选择与体制转轨》,载《苏联东欧问题》1991年第2期;王金存:《东欧中亚国家经济转轨模式议》,载《东欧中亚研究》1993年第6期。

② Anders Åslund, *How Capitalism Was Built: The Transformation of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 Russia, and Central Asia*,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7, pp. 307-311. [法]弗朗索瓦·巴富瓦尔:《从“休克”到重建——东欧的社会转型与全球化—欧洲化》,陆象淦、王淑英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一兵:《东欧的经济转轨和经济发展》,载《国外社会科学》1999年第4期。

③ 该部分经高歌研究员允许参考其文。见高歌:《中东欧民主化与市场化关系初探》,载《俄罗斯学刊》2014年第6期。

④ Adam Przeworski, *Democracy and the Market: Political and Economic Reforms in Eastern Europe and Latin America*,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1. 亦可参见中译本。

⑤ Bela Greskovits, *Political Economy of Protest and Patience: East European and Latin American Transformations Compared*, Budapest: Central European University Press, 1998. 亦可参见中译本。

⑥ Grzegorz W. Kolodko, *From Shock to Therapy: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Postsocialist Transformati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亦可参见中译本。

⑦ Stephan Haggard and Robert R. Kaufman,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Democratic Transition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5. Stephan Haggard and Robert R. Kaufman, *Development, Democracy, and Welfare States: Latin America, East Asia, and Eastern Europ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8.

久,长期从事原苏东国家政治转型研究的丹麦学者奥勒·诺格德(Ole Norgaard)提出了“三阶段论”。他指出,市场化与民主化的关系经历了“机遇空间期”、“暂时衰退期”、“巩固期”三个阶段。在第一个阶段,民众怀抱不切实际的幻想,认为一俟民主建立,效率和福利将自动跟进,从而支持市场化与民主化。进入第二个阶段,民众的“革命激情”逐渐消退,将得到的实惠作为评判政府绩效的标准,同时市场化的变革不可避免地导致效率与福利的暂时性衰退,因而民众的抗议甚至引发的动荡成为民主化进程的组成部分。在第三个阶段,民众逐渐把对经济状况的评估与对政治体制的评价相互脱钩,规范的民主制度真正得到了巩固。而民主制度的巩固又为经济变革持续进展和经济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这样,市场化与民主化进入了良性互动^①。

其二,市场化与民主化孰轻孰重?这个话题在学界也至少出现了三种观点。第一种观点强调市场化、市场经济和经济发展对民主化和民主制度的作用,但根据对作用的认识不同又产生了“相关性论”、“必要条件论”、“市场化先行论”和“双重影响论”四类论点。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P. Huntington)指出,在民主的水平与经济发展的水平之间存在着极高的相关性,经济发展为民主提供基础,经济的迅速增长或经济衰退都会瓦解威权政权。在第三波民主化浪潮中,经济发展的实质程度与短期的经济危机或失败相结合是最有利于威权政权向民主政府过渡的经济公式,但没有一种经济发展的格局自身对导致民主化是必不可少的,或是充分的^②。“必要条件论”者认为,受保障的财产权和竞争的市场经济,是民主得以存在的前提。但市场经济只是稳定民主存在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因为将几乎无限制的权力都交给简单多数,则这一多数所通过的决定往往会侵蚀财产权及法治,损害市场经济和民主制度^③。主张“市场化先行论”的学者认为,虽然民主并非市场体制所必需,对于促进经济的发展,它也不是必不可少的,市场经济可以和不同形式的(专制的或民主的)政治体制共存,但历史事实证明,市场经济先于民主变革,历史上从未有过在市场经济出现之前建立民主制度的事例^④。甚至有学者用计量化数字表明,“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与民主体制稳定之间存在巨大的关

联,即从来没有一个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为6055美元或以上的民主体制遭到过失败”^⑤。罗伯特·达尔(Robert A. Dahl)则认为,市场经济对民主制度有双重影响,它既有利于又不利于民主制度。民主目标和市场经济之间的张力,几乎必将无限期地存在着^⑥。不利的情况正在当下发生着。“20年前经常讨论的一个问题是向市场经济的转型使中东欧社会面临不稳定的重大风险,且危及1989年后民主转型的机会。但这一担心没有成为现实,在随后的10年我们目睹了不同水平的民主巩固。直到今天,危机和市场可能会破坏巩固的民主。”^⑦第二种观点认为民主制度使市场经济具有正当性,而不是相反。胡安·林茨(Juan J. Linz)和阿尔弗莱德·斯泰潘(Alfred Stepan)在对比南欧、南美和后共产主义欧洲的民主化转型之后指出,只有当民主国家中的大多数人不去质疑私人所有权的产生方式的时候,尽管这种质疑可以通过合法的方式进行,私人财产才受到了保护。同时,与非民主制度相比,民主制度还拥有合法性以及可变更的选举体制两种宝贵资源,使其与持续的经济低迷摆脱干系^⑧。最后一种观点指出,市场化和民主化之间是相互作用的。民主化决定市场化的方向及制度边界,推动或阻碍市场化进程。市场化的动力是民主化的一大诱因,市场化的发生、发展及其结果,又直接牵制或推动着民主化进程的发展。中东欧国家是民主化先行方

① Ole Norgaard, *Economic Institutions and Democratic Reform: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Post-Communist Countries*, Northampton: Edward Elgar Publishing, 2000. 亦可参见中译本。

② Samuel P. Huntington, *The Third Wave: Democratization in the Late 20th Century*, Oklahoma: University of Oklahoma Press, 1993. 亦可参见中译本。

③ [加] A. 布莱顿、[意] G. 卡罗地、[法] P. 赛蒙、[加] R. 温特伯:《理解民主——经济的与政治的视角》,毛丹等译,学林出版社2000年版。

④ Takashi Inoguchi, Edward Newman, and John Keane, eds., *The Changing Nature of Democracy*, Tokyo: United Nations University Press, 1998. 亦可参见中译本。

⑤ James F. Hollifield and Calvin C. Jillson, eds., *Pathways to Democracy: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Democratic Transitions*, New York: Routledge, 1999. 亦可参见中译本。

⑥ Robert A. Dahl, *On Democracy*,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0. 亦可参见中译本。

⑦ Jacques Rupnik and Jan Zielonka, Introduction: *The State of Democracy 20 Years on: Domestic and External Factors*, *East European Politics and Societies and Cultures*, Vol. 27, No. 1, February 2013.

⑧ Juan J. Linz and Alfred Stepan, *Problems of Democratic Transition and Consolidation: Southern Europe, South America, and Post-Communist Europe*, Baltimore, MD: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6. 亦可参见中译本。

式的转型，即首先放弃社会主义道路，通过建立西方宪政民主制度实现政治制度的转型；在此前提下，实现经济制度和体制的市场化转变。尽管在转型初期经历了严重的经济衰退和动荡，中东欧国家并没有出现严重的倒退，而是实现了民主制度与市场经济的较高水平的均衡。中东欧的民主化与市场化进程相互依赖，缺一不可^①。欧洲复兴开发银行《转型报告 2013》通过数据分析证实了民主化与市场化之间存在较强的关联，民主制度较为完善的转型国家倾向于采取更进一步的经济改革措施，也能够实行更好的经济制度并促进经济增长^②。

客观地说，中国学术界对于这些话题缺乏深入的讨论，大多停留在对市场化 and 民主化的描述、阶段概括等层面，深入的探讨主要集中在对中东欧国家转型的政治和经济关系上。高歌认为，中东欧国家经济转型与政治转型进程间存在一致性，或者相互掣肘，或者是相互促进。徐坡岭等学者则认为，中东欧国家经济转型与政治转型的相互关系中，政治转型更具独立性，并对经济转型及经济增长具有制约作用^③。

第五，转型是否结束？自东欧国家政局变动始，转型是否结束这个话题一直存在着。早在 1995 年，捷克总理克劳斯就认为转型已经结束了^④。1996 年，玛丽·拉维尼 (Marie Lavigne) 也认为，中欧甚至东欧国家的转型大体上已经结束，尽管当时对这些国家转型的后果进行评估为时过早^⑤。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为经济学家和政策制定者们观察和理解制度、法律、政治等方面的变化提供了脉络，但是，一个迄今尚未得到认真考虑的问题是转型进程是否已经结束？与之相关的是，转型进行到何种程度将确保市场体制的繁荣与成熟？完成转型的制度、经济和政治标准又是什么？1997—1998 年，六位国际知名的经济学家包括玛丽·拉维尼、阿兰·盖尔伯 (Alan Gelb)、安德斯·阿斯伦德 (Anders Åslund)、尼古拉斯·拉迪 (Nicholas Lardy)、扬·什韦纳尔 (Jan Švejnar) 以及雅诺什·科尔奈 (János Kornai) 对这些问题做出了回应，并提出了自己的答案，他们的智慧成果最终由美国西密歇根大学安妮特·布朗 (Annette N. Brown) 编辑成《转型何时结束》于 1999 年出版^⑥。六位经济学家的观点有相同之处，但呈现更多的是不同面^⑦。大部分

经济学家“通常认为转型会有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主要是自由化和稳固化，第二阶段则包括了无数结构上的改革……他们大体同意第一阶段在多数国家都已经完成了，但是第二阶段的进展和成功却出现了分化”。六位经济学家关于转型是否结束的意见基本不同。拉维尼认为，加入欧盟即意味着转型结束。盖尔伯直接回答道：当一个转型国家遇到的问题和其他处于相同水平的国家的问题相似意味着转型结束。阿斯伦德表示，转型是否结束在于权力寻租的减少，因为这反映了体制改革的活力。拉迪认为，转型结束的标准至少包括国有企业、金融部门和政府开支的减少或放开。什韦纳尔指出，中央计划的废除和有效的市场体制是转型结束与否的标准。科尔奈最后表示，一党专政的废除、生产资料私人所有和市场是经济活动的主导是转型结束的三个标准^⑧。马克·祖尔克 (Marc Suhrcke) 认为上述六位经济学家关于转型结束的标准仍然不清晰，尤其是经济指标很难界定，原因在于人们是否信任这些数据^⑨。

2009 年，多伦多大学奥列格·哈韦里逊 (Oleh Havrylyshyn) 教授在东欧政局变动 20 周年之际再次抛出了这个议题。在他看来，中欧和波罗的海国家已经完成转型，其他一些国家尚未完成，有的国家已经接近，但还有一些国家仍有不小的差距。同时，与此前定义转型及判断转型是否结束的纯量化

① 程伟、徐坡岭：《中东欧独联体国家转型比较研究》，经济科学出版社 2012 年版。

② 参见 European Bank for Re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 Transition Report 2013。

③ 高歌：《东欧国家经济转轨与政治转轨关系》，载《东欧中亚研究》2001 年第 4 期；徐坡岭、王旃欢：《经济转型与政治转型的关联：中亚、东欧国家间的差异及解释》，载《俄罗斯学刊》2012 年第 6 期。

④ 转引自 Oleh Havrylyshyn, Is The Transition Over? Possible Definitions and Some Measurements, Queen's Economics Department Working Paper, No. 1209, 2009。奥列格认为克劳斯当时的观点是不成熟的。

⑤ Marie Lavigne, Russia and Eastern Europe: Is Transition Over?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 Vol. 23, No. 1, 1996。

⑥ Annette N. Brown, ed., When Is Transition Over? Kalamazoo, MI: W. E. Upjohn Institute for Employment Research, 1999。

⑦ 观点的差异与他们的国别背景（西欧、中东欧转型国家以及美国等）、工作经历（学术研究者、世界银行工作人员以及政策咨询人员等）以及对共产主义国家与后共产主义国家研究与关注的时间长短不一有关。Annette N. Brown, ed., When Is Transition Over? pp. 1-3。

⑧ Ibid. p. 7。

⑨ Marc Suhrcke, Is Transition Over? Intereconomics, Vol. 35, No. 3, 2000, pp. 105-106。

标准不同,奥列格强调以“特征化事实”(stylized facts)作为转型是否结束的标准。2013年,莫斯科高等经济学院教授康斯坦丁·索宁(Konstantin Sonin)认为,不仅中东欧国家而且所有原苏东社会主义国家从计划到市场的经济转型都已经结束,虽然各国经济发展处于不同的阶段^①。在同一期发表的争论文章中,哥伦比亚法学院教授卡塔琳娜·皮斯托(Katharina Pistor)不同意索宁的看法,认为恰恰相反,原苏东国家的经济转型仅仅处于开始阶段^②。切扎尔·斯卡尔拉特(Cezar Scarlat)和西尔维亚·鲁钦斯卡(Silvia Ručinská)倾向于折中的观点,他们以罗马尼亚和斯洛伐克为例表明中东欧国家经济转型与衰退之间存在“钟摆效应”现象^③。

可见,从转型之初起,“转型是否终结”一直是学界关注的重要话题,其讨论的结果也莫衷一是。客观地讲,多数学者认为中东欧国家的经济转型已经结束,但关于结束的标准则各有不同的看法^④。

第六,转型的国际比较。第三波民主化浪潮以来,许多国家(或地区)都处于转型进程当中。这些地区(国家间)的转型发展或处于相似或相同阶段,或具有较大差异,进行比较研究可以找到一些具有共性的基础,也可以挖掘地区或国家自身发展的独特性。20世纪90年代以来,以东亚、南欧、拉美、中东等为类别进行比较的转型研究渐渐兴起,它通常包括地区内、地区间和跨地区比较三类情况。其中,地区间的比较通常关涉与转型进程相联系的议题,如民主化、市场化、工业化、地区化和民族主义等。国内外学界拿中东欧与其他区域进行对比的研究层出不穷。前引胡安·林茨和阿尔弗莱德·斯泰潘对南欧、南美和后共产主义欧洲的民主化转型的对比,普沃斯基对中东欧与拉美民主与市场的比较,以及奥勒·诺格德关于原苏东国家转型的对比分析都是比较优秀的研究成果。另外,安德斯·阿斯伦德对中东欧、俄罗斯以及中亚国家如何建立资本主义以及建立起来的资本主义类型进行了深入对比,马丁·麦安特等学者对中东欧、俄罗斯以及中亚国家的经济转型进行对比分析,海歌德和考夫曼从福利国家建设的视角对中东欧与东亚、拉美国家的福

利制度进行了比较,亨利克·斯泽拉菲尔(Henryk Szlajfer)则从全球化视角对比考察了中欧国家与拉美国家转型的经验教训^⑤。

与中东欧国家一样,中国同处于转型进程当中。国外学界对中国与中东欧国家转型尤其是经济转型进行比较的论著非常多,而且有关中国与中东欧社会主义体制、意识形态领域的比较研究也有不少^⑥。相比,中国学界在这方面的研究不多,既没有一本有关的专著问世,仅有的研究也主要集中在对经济转型的比较^⑦。虽然中东欧与中国转型的内涵、环境和目标等方面均有所差异,但对中东欧与中国转型的成败得失进行比较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从这个意义上讲,国内中东欧学界或者转型相关研究人员在这个方面仍有不少功课要做。

三、转型相关问题的研究

除了在转型某个节点或时段的研究以及关于转型重要问题的探讨外,还有一些与转型相关问题的研究也不断呈现。这些研究从一个具体层面、一个重要视角、一个理论畛域深化了人们对中东欧国家转型的认知。

^① Konstantin Sonin, *The End of Economic Transition*, *Economics of Transition*, Vol. 21, No. 1, 2013, pp. 1-10.

^② Katharina Pistor, *Towards a New Transition Economics: Comments on Konstantin Sonin's 'The End of Economic Transition'*, *Economics of Transition*, Vol. 21, No. 1, 2013, pp. 11-16.

^③ Cezar Scarlat and Silvia Rucinska, *Some Considerations on Ending the Process of Economic Transition in Romania and Slovakia*, *European Research Studies Journal*, 2013.

^④ Grzegorz W. Kolodko, *The Great Transformation 1989-2029, Could It Have Been Better? Will It Be Better?* UNU-WIDER Working Paper, Vol. 40, 2010; Adelina Marini, *Poland: the transition is over and is successful*, *EUInside*, July 5, 2011.

^⑤ Anders Åslund, *How Capitalism Was Built: The Transformation of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 Russia, and Central Asia*, 2007; Henryk Szlajfer, *Economic Nationalism and Globalization: Lessons from Latin America and Central Europe*, Chicago and New York: Haymarket Books, 2014.

^⑥ Nina Bandelj and Dorothy J. Solinger, *Socialism Vanquished, Socialism Challenged: Eastern Europe and China, 1989-2009*,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2; [比]约翰·思文、[美]罗思高:《发展转型之路:中国与东欧的不同历程》,田士超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⑦ 仅举几个代表性的论文,如刘书林:《试论社会主义国家改革的基本政治经验——中国与苏联东欧国家改革的比较研究》,载《政治学研究》2008年第4期;王晓峰:《中国与东欧及前苏联的经济改革比较——杰弗里·萨克斯对中国经济改革的论述》,载《生产力研究》2009年第21期。

第一, 转型与金融危机。研究这个话题, 不仅可以了解中东欧国家经济运行、金融监管等状况, 还能通过金融危机发生的机理引发对中东欧国家转型经济增长模式的思考。2008年金融危机发生和随后在中东欧国家登陆后, 国内外学者普遍注意到这一点, 相关的研究层出不穷。这些研究主要集中于对中东欧国家金融危机遭受的冲击、发生的原因以及进行的应对等方面的分析, 有少量论著从转型的视角考察了金融危机发生的机理, 并由此对转型模式进行评估^①。另外, 在中国学界, 对中东欧国家转型进程中吸引外资、金融和银行业运作的研究一直就有关注。这些研究或者从经济转型的角度考察金融、投资的稳定性与风险, 或者从欧盟大市场的层面分析中东欧国家金融行业面临的机遇与挑战^②。

第二, 转型与社会领域的变化。客观地讲, 无论是中国学界还是西方学界都偏重于转型的政治、经济以及对外关系的分析, 从社会学层面来考察中东欧转型进程的似乎不多。这里面至少有两点可以深入讨论。其一是中东欧转型中国家、市场与社会的关系。对这三者关系进行讨论的一个优秀著作当属卡尔·波兰尼的《大转型》, 该书提供了一个分析转型社会中国家、市场与社会关系互动的理论框架。虽然它探讨的是工业革命的大转型带来的经济和社会的巨大变化, 对于后来的转型实践同样有着重要的理论启发。中东欧转型中社会关系变化突出的一个表现是公民社会或市民社会(Civil Society)建设。国外学界对中东欧国家公民社会建设取得的成就、存在的缺陷都有关注^③。相比, 中国学界只有少量的论著对中东欧公民社会状况进行研究^④。其二是有关中东欧国家社会福利政策的研究。同样的情形是, 国外学界对于中东欧国家社会福利政策的内涵、运作以及实践意义有较多的研究, 并主要分次区域(中欧或东南欧)、国别、领域(养老金、住房、教育、就业、医疗等)以及比较(与俄罗斯、独联体、拉美等)进行^⑤。相比较, 中国学界对中东欧社会福利的研究屈指可数, 多数研究也仅仅停留在介绍和叙述层面, 20世纪90年代以来关注度呈下降趋势, 在国别研究中主要以波兰、匈牙利为代表^⑥。

第三, 转型与加(欧)盟入(北)约。东欧国

家政局变动后, 这些国家无一例外地选择“回归欧洲”, 融入“欧洲一大西洋进程”多数中东欧国家在20世纪90年代先后获得了入盟候选国资格, 西巴尔干国家的入盟资格前景直到2003年“萨洛尼卡进程”启动才得以确立。转型与入盟是相互关联但并非完全相同的进程, 入盟不是转型的终点, 转型也离不开入盟的大背景。国内学界较少将两个进程进行专门的相关性研究, 相反, 国外不少学者将两者结合起来分析, 有的还带入了“全球化”、“地区合作”、“民主化”等因素进行考察^⑦。

第四, 转型与现代化。一般认为, 中东欧国家

① 中国学者的论著有: 孔田平:《试论国际金融危机对中东欧国家的影响》, 载《俄罗斯中亚东欧研究》2009年第4期; 徐刚、项佐涛:《金融危机下的中东欧: 冲击及其应对》, 载《现代国际关系》2010年第1期; 庄起善、吴玮丽:《为什么中东欧国家是全球金融危机的重灾区?》, 载《国际经济评论》2010年第2期。西方学者的论著主要有: Ebru Terazi and Seçil Şenel, *The Effects of the Global Financial Crisis on the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an Union Countrie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Business and Social Science*, Vol. 2, No. 17, 2011; Ignazio Visco, *The Impact of the Crisis on Financial Integration in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 *Ročník*, Vol. 21, No. 5, 2013。

②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庄起善教授在这方面有独到的研究。如庄起善、王席:《中东欧国家金融银行业开放过程中的不稳定因素研究》, 载《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6期; 庄起善、曹煥:《中东欧国家金融银行业开放过程中的潜在风险分析》, 载《世界经济研究》2011年第10期; 庄起善、曹煥:《中东欧国家银行业多元化经营对传统业务影响分析》, 载《世界经济研究》2013年第5期; 庄起善:《中东欧转型国家金融银行业开放、稳定与发展研究》, 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③ 这里只列举关于缺陷的著作。Marc Morjé Howard, *The Weakness of Civil Society in Post-Communist Europ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 Petr Kopecky and Cas Mudde, *Uncivil Society?: Contentious Politics in Post-Communist Europe*, London: Routledge, 2003。

④ 郭洁:《东欧转型国家公民社会探析》, 载《科学社会主义》2009年第4期; 金雁:《走向公民社会: 转型时期的东欧民间组织》, 载《爱思想金雁专栏》, <http://www.aixixiang.com/data/73229.html>; 徐贡:《中国公民社会如何向东欧学习?》, 载《爱思想徐贡专栏》, <http://www.aixixiang.com/data/25612.html>

⑤ Alfio Cerami and Pieter Vanhuysse, eds., *Post-Communist Welfare Pathways: Theorizing Social Policy Transformations in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 Basingstoke: Palgrave Macmillan, 2009; Marija Stambolieva and Stefan Dehnert, eds., *Welfare States in Transition - 20 Years after the Yugoslav Welfare Model*, Sofia: Friedrich Ebert Foundation, 2011。

⑥ 如陈双苑:《东欧国家的社会福利问题》, 载《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1994年第2期; 葛霖生:《论原苏联东欧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 载《世界经济与政治》1995年第5期; 王岐山:《东欧如何重建社会保障体制》, 载《当代世界》1996年第12期; 张国凤、王小燕:《东欧国家的社会保障制度及存在的问题》, 载《今日东欧中亚》1997年第5期; 徐刚:《西巴尔干国家社会福利制度转型评析》, 载《欧亚经济》2014年第5期; 王庆超、陈弘:《东欧转型国家的福利制度建设》, 载《未来与发展》2014年第6期。

⑦ Kenneth Dyson, *Enlarging the Euro Area: External Empowerment and Domestic Transformation in East Central Europ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Matjaz Nahtigal, *From Transition to the European Integration: Institutional Transformation of the Countries in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 VDM Verlag, 2008。

在 20 世纪拥有三次现代化的机遇。第一次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第二次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第三次是冷战结束至今。从政治发展的角度讲,东欧国家第三次现代化的进程,恰巧同世界民主化“第三波”浪潮相叠合。从过程和结果来看,前两次现代化均没能成功,要么被战争破坏,要么走进了体制的死胡同,真正开启现代化进程是冷战结束以来的事。国内学者对中东欧国家现代化的研究只有为数不多的几篇文章^①。相反,国外学界重视对中东欧国家现代化的研究,特别是注重从大转型的视角来讨论现代化的发生、发展与存在的问题^②。尤其要提到的一点是,中东欧国家实现现代化的目标即追赶西欧或者说与西欧国家趋同,趋同(convergence)成为学者们关注的焦点^③。

此外,对中东欧国家转型与宗教、文化、民族、法治(尤其是转型正义^④)以及外部环境^⑤等相关性的讨论也有许多不错的成果。以宗教为例,国外学者的研究既有关于中东欧宗教的一般性研究,也有专门从转型视角对中东欧国家宗教进行的讨论^⑥。而在国内学者中,对中东欧宗教进行专门的研究非常鲜见,章远的《宗教功能单位与地区暴力冲突(以科索沃冲突中的德卡尼修道院和希南帕夏清真寺为个案)》^⑦专著是目前仅有的一本关于中东欧地区宗教研究的作品,同时也是一部有关宗教学与政治学交叉研究的出色成果。

(责任编辑 李淑华)

① 王义祥:《东欧现代化的历史轨迹》,载《今日东欧中亚》1995年第6期;杨焯:《20世纪东欧国家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历史评析》,载《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1年第5期。值得提及的是,有几篇文章注意到了中东欧国家现代化进程中的人的发展,如陈熙玮:《东欧剧变以来人民思想情绪的变化情况》,载《东欧中亚研究》1992年第6期;刘康:《如何保障人的全面发展:原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教训》,载《探索》2002年第5期;朱晓中:《宪法要保障个人自由才能推动社会进步》,载凤凰网历史栏目2013年5月2日, http://news.ifeng.com/history/shijieshi/special/zhuxiaozhong/detail_2013_05/02/24868039_5.shtml

② Bruno Grancelli, eds., *Social Change and Modernization: Lessons from Eastern Europe*, Berlin and New York: Walter de Gruyter, 2011.

③ 例如,肖灿夫、舒元、李江涛:《欧洲经济一体化、区域差距与经济趋同》,载《国际贸易问题》2008年第11期;邓翔、路征:《欧盟区域经济趋同的实证分析》,载《江西社会科学》2009年第1期;David Dickinson and A. W. Mullineux, eds., *Financial and Monetary Integration in the New Europe: Convergence Between the Eu and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 Edward Elgar Pub, 2002.

④ 转型正义(Transitional Justice)是民主国家(尤其中东欧国家)对过去政府违法和不正义行为的弥补,通常包括司法、历史、行政、宪法、赔偿等层面。美国2001年成立的转型正义研究中心(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Transitional Justice)有大量关于中东欧国家转型正义的文章出现。近年来,有关中东欧国家转型正义的专著越来越多,参见Olivera Simic and Zala Volcic, eds., *Transitional Justice and Civil Society in the Balkans*, Springer, 2013; Lavinia Stan, *Transitional Justice in Post-Communist Romania: The Politics of Memor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4.

⑤ 这里主要指国际组织在中东欧转型进程中的作用,参见Ronald H. Linden and Pavel Cernoch, *Norms and Nannies: The Impact of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on the Central and East European States*, New York: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2002; Grigore Pop-Eleches, *From Economic Crisis to Reform: IMF Programs in Latin America and Eastern Europ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8.

⑥ 前者如Timothy A. Byrnes and Peter J. Katzenstein, *Religion in an Expanding Europ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6; 后者如Gert Pickel and Kornelia Sammet, eds., *Transformations of Religiosity Religion and Religiosity in Eastern Europe 1989-2010*, Springer, 2012.

⑦ 章远:《宗教功能单位与地区暴力冲突:以科索沃冲突中的德卡尼修道院和希南帕夏清真寺为个案》,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